

# 论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sup>①</sup>

王志军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对资本主义传统社会毫不妥协的革命者、批判者，同时也是一个吸取了多种文化滋养的文化巨匠，正因如此，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应被忽略。本文将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概括为：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精神气质的影响；二是犹太教对现实的、社会的“人”的重视与马克思思想的主旨具有一定的暗合性；三是与基督教的“博爱”“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义”和现实生活，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有一定联系；四是马克思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犹太教与对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批判直接对应起来；五是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蕴含着明显的犹太情怀。

关键词：马克思 犹太教 影响

作者王志军，1969 年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无论从父系或者母系来看，马克思都是出生于一个纯正的犹太世家。他的祖父马克思·利维是一个犹太拉比，马克思的伯父是特利尔城（Trier，马克思的故乡）的首席拉比。马克思的祖母爱娃·里沃夫也出身于犹太拉比世家，里沃夫家族产生过不少著名的犹太宗教学者。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列斯波克也同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荷兰拉比家庭。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马克思 35 岁（1817 年）时宣布放弃犹太教信仰，成为一名基督教新教信徒，并把自己的原来名字“希尔舍”（Herschel）改成一个基督教名字“亨利希”（Heinrich）。1824 年，亨利希·马克思让他的 6 个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新教洗礼，此时，马克思只有 6 岁。从中学时代的作文中，人们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有着较浓厚的基督教情怀：“和基督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这种一致我们就会被上帝抛弃，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们。”<sup>②</sup>“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出于对神的爱”。<sup>③</sup>随着思想的逐步发展，马克思成为一个宗教批判

<sup>①</sup>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060400985）主要成果之一。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傅有德教授的指导、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1982 年，第 820 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 822 页。

的领袖人物，在博士论文中，他借着普罗米修斯的口说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sup>①</sup>。在随后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sup>②</sup>，而且发出了对转入云霄之中的宗教王国的世俗基础“革命化”的呼唤<sup>③</sup>。

犹太教家庭可能对于马克思产生的特殊影响、西方传统文化强烈的基督教情节，以及成年以后的无神论思想倾向，为人们正确地评价马克思思想与犹太教的关系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也增添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新内容。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们的思想界，只能见到为数极少的几篇关于马克思同犹太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论文，因此，重新探讨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必要的。

## 一、被夸大了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

当代一些神学家、思想家指出马克思思想的特质与犹太先知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指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保留了无法抹去的犹太思想的根本特征。他们强调马克思思想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末世论的密切联系，在将马克思思想解读为“自然主义”、“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同时，相信这些观念背后隐藏的就是犹太弥赛亚主义的推动力。在我们看来，这些思想家们正在有意无意地夸大他们的这种“发现”，主要表现为：

第一，否认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意义，夸大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与犹太教的关系。对于伯兰特·罗素而言，马克思思想无非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sup>④</sup>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支配了他的一生”，在他写的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他的那些貌似科学的预言的感情基础”<sup>⑤</sup>；二是马克思有着“一种只能从有神论找到根据的宇宙乐观主义。”<sup>⑥</sup>罗素这种对于马克思的评价与他先前的观点保持了一致：“正是这种夙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所熟悉的感情内容使得马克思的末世论有了信仰的价值”，因为“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sup>⑦</sup>。沿袭着这种思维模式，宾克莱宣称：如果“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借用尼采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sup>⑧</sup>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信念，都可能是早年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而且会“令人想起公元（前）八世纪希伯莱的先知”<sup>⑨</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第18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25页。

<sup>③</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1995年，第55页。

<sup>④</sup>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40页。

<sup>⑤</sup>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43页。

<sup>⑥</sup>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44页。

<sup>⑦</sup>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47—448页。

<sup>⑧</sup>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6页。

<sup>⑨</sup>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2页。

在宾克莱眼中，马克思更象《旧约》中的“先知阿摩司”<sup>①</sup>，因此，马克思首先应该是“一位道德家”或“宗教道德家”，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或历史哲学家”<sup>②</sup>。

第二，否认马克思思想现实性、世俗性等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夸大犹太教历史观与马克思历史观的联系。汤因比认为，马克思“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即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像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像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代替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sup>③</sup>在汤因比看来，“由于马克思根据无休止的阶级斗争（a perpetual class war）的观点，对社会动力问题做了更为严密深入的分析，这种社会解体与阶级冲突的结合已为现代人所相当熟识。马克思勾勒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画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关于社会危机—文明社会解体的伴侣—的经典说明，也因为这个公式符合传统犹太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那种上天启示的模式，即在一番极度的狂暴过去之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美好的结局。”<sup>④</sup>

第三，否认马克思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独特的、巨大的革命作用，夸大犹太教“弥赛亚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相似性。在 20 世纪的德国和英美都非常具有影响的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个先知主义的档案、是一项判决、是一种对行动的呼吁，而绝不是一种纯粹科学的、建立在经验事实之上的分析。”<sup>⑤</sup>在洛维特看来，《共产党宣言》奠基性前提不是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还是把历史看成两大敌对阵营之间日益尖锐的斗争的一般观点，尤其是这种斗争的戏剧性高潮，都不能以纯粹经验的方式得到证明。”<sup>⑥</sup>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弥赛亚主义”，是以科学的预言外表掩盖下的信仰的真实，“即使他（马克思—笔者注）是 19 世纪的自由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宗教的，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他也还是一个受《旧约》局限的犹太人。从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两千年之久的经济史都无法改变的古老的犹太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以及犹太人对无条件正义的坚持，都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sup>⑦</sup>。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同样认为：“马克思是很典型的犹太人，他在很久以后解决了那个古老的圣经题目：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得到自己的食物。犹太人那种从土地上得到快乐的需求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以新的形式和另外一种社会条件得到了说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学说与犹太教宗教传统已割断了联系，它反对

<sup>①</sup>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96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100 页。

<sup>③</sup>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11 页。

<sup>④</sup>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98—200 页。

<sup>⑤</sup> 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三联书店，2002 年，第 51 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 52 页。

<sup>⑦</sup> 同上书，第 52—53 页。

任何神圣物，然而，马克思却把留传在犹太民族—上帝选民中的弥赛亚思想移用到了无产阶级身上。”<sup>①</sup>当今过程哲学的领军人物，美国哲学家、神学家小约翰·科布（J. B. Cobb）也认为马克思受到犹太预言遗产对正义、对被压迫者关怀的深刻影响，它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历史观念背后的推动力就是犹太弥赛亚主义。<sup>②</sup>

## 二、被忽略了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

与以上观点完全不同，一些学者们认为，由于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自己与犹太教存在密切联系，相反“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非犹太人，且尽量使外人确信他的非犹太性”。<sup>③</sup>由此，他们认为，马克思思想与犹太教，乃至任何宗教都不存在联系，于是，问题又被导引到了另一个极端，主要表现为：

第一，把宗教看成人民的精神鸦片，忽略它对人类文明产生过的重大影响。人们常常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④</sup>这句格言作为马克思对宗教理解的界碑性标志，从而否认了任何一种宗教对马克思产生影响的可能。“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sup>⑤</sup>列宁依据当时俄国社会现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任务而对宗教所采取的灵活态度，被看成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成为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指导原则之下，探讨马克思与犹太教的关系当然是愚蠢的、不明智的。

第二，以历史、时代的宏大叙事为依托，忽略个体思想成长的复杂性、特殊性、整体性。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背景，人们更多地从 19 世纪的经济、政治、自然科学、无产阶级革命等的发展着眼，对于马克思特殊的家庭、教育、信仰等较为具体的事件却论述的不多、研究的不够。比如，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而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可能是与对近代欧洲启蒙思想的向往有关，更有可能同欧洲长期对犹太人的迫害关系密切。因此，马克思的父亲为了继续从事他的律师职业，保护全家不受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放弃犹太教皈依基督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原因。然而，在德国民众著名社会活动家弗·梅林笔下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在他眼中，老马克思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行动，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进一步的表现。它的意义还在于：“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是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 70—71 页。

<sup>②</sup> 参见小约翰·B·科布：《马克思与怀特海》，《求是学刊》，2004 年第 6 期。

<sup>③</sup> Ezar Mendelsohn, ed., Essential Papers on Jews and the Lef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p. 4.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95 年，第 2 页。

<sup>⑤</sup>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7 页。

产留给了他的卡尔（马克思一笔者注）。”<sup>①</sup> 在这里，启蒙思想像夏季里闪电似的初现在少年马克思心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在抽象的、宏大的叙事面前，个体的信仰、情感、痛苦与挣扎都被消解了，同时，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被消解了、不见了。从摆脱这一抽象理论的角度出发，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正是这种强迫改变信仰的法令，使得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特殊的处境，从而使马克思后来成为一切宗教的叛逆者<sup>②</sup>。

第三，有的学者从引述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出发，认为尽管从人种学的角度上说，马克思有百分之百的犹太血统，但马克思与犹太教不存在根本的联系。他们认为“他（马克思一笔者注）对犹太教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也没有继承任何犹太教法学家及塔木德学者的素质或特性”。因为“这些都是后天获得的，而不通过血统来传递的。”<sup>③</sup> 甚至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对犹太教的激烈批判，认为马克思也是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思想歪曲成提倡消灭犹太人的理论：“马克思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扎根于他内心深外并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最后”<sup>④</sup>。于是得出一个结论：“追究马克思思想与犹太——基督教思想的亲和性，并没有多大意义。”<sup>⑤</sup>

### 三、犹太教对马克思影响的几种表现

被夸大的和被忽略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产生了阻碍作用，是应该给予正视和回答的（犹太宗教文化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学术热点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犹太教（Judaism，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犹太文化）有着一种比单纯宗教信仰更为广泛的蕴意，很难将其与基督教（Christianity）做严格的对应，这一点更像西方人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儒教（Confucianism），即一种影响中国人思维、行为、伦理、生活方式的礼教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犹太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它除了包涵一套宗教的教义、律法和组织之外，还包涵了犹太民族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各种行为准则以及独特的思维、生活方式。这里，我们将犹太教对马克思的主要影响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精神气质的影响。正如一首经典乐章的精华不是可以通过分析构成它的各个音符所能把握的，犹太教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不是可以通过引用几段他的言论就能证明的。家庭、传统、时代精神，以及整个生活共

<sup>①</sup> 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sup>②</sup> 参见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New York: Time, Inc, 1963, p. 27.

<sup>③</sup> Julius Carlebach, Karl Marx and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Juda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78, P. 320.

<sup>④</sup> Ezar Mendelsohn, ed., Essential Papers on Jews and the Lef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7, p. 393.

<sup>⑤</sup>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26页。

同体的习惯、价值、理想、情感是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美好情怀，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思考的工作习惯，对真理执著的追求精神，用人类已有的知识来武装自己，从前人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这些特殊气质和研究方法，与许多犹太著名学者的风格是非常相似的。犹太教在长期的重压下所形成的坚韧和不屈不挠为理想奋斗的崇高精神；犹太教的苦难意识以及虔诚、执着，对信仰所持有的超验、非功利追求，也与马克思在精神气质上有共同之处。马克思的一生不屈从任何权贵；他颠沛流离、没有祖国（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不许他入境，半数以上的欧洲国家都向他发出过驱逐令）；他的全家常常仅能以面包和土豆糊口，他的一对爱子、一个爱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先后夭折的个人生活历程，有如一幅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坚持信仰、历尽苦难、永不妥协的缩影。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与马克思合作了一生的恩格斯才会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sup>①</sup>

第二，犹太文化对现实的、社会的“人”的重视与马克思思想的主旨具有潜在的一致性。犹太教是以对上帝信仰为前提的，但是更加重视律法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犹太教的主题不是上帝而是人，它注重的是人自身正确的行为而不注重对上帝的沉思：“以色列的思想以人为中心，所有的以色列思想家都接受了这个首先由先知们圈定的中心论题。”<sup>②</sup>通过上帝，人发现了自身的真诚与谦恭、勇敢与和平，因此，犹太教的所有特征表明，“犹太教的重点不在抽象概念，而在人，人的生活和人的良心”。<sup>③</sup>毫无疑问，“人”也是马克思哲学的主题：马克思一进入哲学的舞台，就确立了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sup>④</sup>而奋斗，“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sup>⑤</sup>的目标。他把对宗教的批判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sup>⑥</sup>；他把人工的生活形容为又退回到被文明污染的“穴居”、朝不保夕的“停尸房”<sup>⑦</sup>的异化状况；他对把人的尊严通通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sup>⑧</sup>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特点的指认；他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冷峻揭示等等，直至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烈地感动、震撼着现代思想家的心扉。可以说在马克思这里，将“人”作为其思想主旨、中心的倾向更为鲜明与极端。同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倾向与受到犹太宗教文化浸染的其它犹太血统的思想家们的思想亦多有一致之处（如，弗洛姆、弗洛伊德等），他们都采取了一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高目标的价值取向，“最高价值是人自身的理性、爱、同情、勇气等能力的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年，第60页。

<sup>②</sup>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sup>③</sup> 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982年，第7页。

<sup>⑤</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14页。

<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9—10页。

<sup>⑦</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sup>⑧</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75页。

理想的发展。所有世俗的成功都从属于这最高的人的(或精神的或 X)的价值。” “圣经及以后的犹太传统中有一些核心价值就是对生命的确证、爱、正义、自由和真理。”<sup>①</sup>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共同认可的思想基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一原则上看出些许端倪。

第三,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义”和现实生活,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情批判有一定联系(犹太教这种思想观念比基督教精神更能激发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圣经》中那些针砭时弊、疾恶如仇、无私无畏、预言未来的先知精神,遗传给了后来的犹太人,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无论耶稣、保罗、斯宾诺莎、弗洛伊德,还是马克思都在犹太文化传统影响之内。换句话说,这些超越于犹太传统的犹太异端仍然与犹太文化传统联系着。只不过他们看到了犹太教过于狭隘,过于陈腐、闭塞的一面,他们都在寻找超越了犹太文化的理想:“他们自觉地吸收了犹太生活和犹太智慧中的一些精华,他们的‘超前’优势在于作为犹太人,他们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的交界线上,他们诞生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交汇处。他们的思想成长在最为丰富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们生活在他们各自的国家的边缘,或隐蔽处。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会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属于它而又超然于它。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创造了超乎其社会之上,超乎其国家之上,也超乎其时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他们的精神遨游在宽阔的地平线上,向遥远的未来申延。”<sup>②</sup>爱因斯坦的话则更为直截了当:“象摩西、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些人物,尽管他们并不一样,但他们都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生活,而自我牺牲;而引导他们走上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的,正是他们祖先的传统。”<sup>③</sup>以改变世界的意志去面对现实世界,以乐观主义者的心态呼唤公义、平等的来临,蔑视、不屈从这个世界中的邪恶与冷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思想与犹太民族反压迫、追求平等和正义的奋斗历程和传统有着一定的暗合性。

第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马克思眼中犹太教与金钱拜物教有着内在联系,于是,马克思将作为一种行为、价值理念的犹太教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批判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犹太商人为金钱而工作的品格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sup>④</sup>。在他眼中,犹太教正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犹太教把犹太人变成了经济利益的奴隶,只知道追逐实惠及利润。马克思说:“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

<sup>①</sup> Erich Fromm. You shall as be Gods, Lowe&Brydone(printers)Limited, 1967, pp58-59, p180.

<sup>②</sup> Paul R. Mendes — 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ed.,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31.

<sup>③</sup>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4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47页。

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sup>①</sup> 犹太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sup>②</sup>。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亦有着同样的思想：“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sup>③</sup> “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sup>④</sup>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对金钱和上帝的态度，都是人的一种异化形式。在一种情况下，人在心理上把自己异化在上帝之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人在物质上把自己异化在金钱之中（当然马克思将宗教异化与经济的异化联系起来与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摩西·赫斯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sup>⑤</sup>）。马克思认为犹太教之所以能够与基督教并存、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基督教世界保存自己的地位，就是因为以拜金主义为特征的犹太精神的存在，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sup>⑥</sup>，也就是说，犹太精神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法则。

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倾向，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认为，马克思的整个革命学说都是建立在他对犹太人的宗教与金钱关系的论述之上：“不劳而获的犹太人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真正的疾病是对金钱的崇拜，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便是资本主义。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不仅仅是犹太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此，这个阶段必将被消灭。”<sup>⑦</sup>在这个意义上，“‘犹太教’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宗教意义，而且也缺少种族的内容。”<sup>⑧</sup>沿袭着犹太教与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相联系的思维，马克思认为实践中的犹太教，无非就是完备的基督教世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彻头彻尾地渗透了商业犹太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sup>⑨</sup>明确地将犹太人的解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人类的解放结合在一起<sup>⑩</sup>。当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成的，犹太教中的拜物教特点只是其中之一，而且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也不断为其所扬弃、深化。

第五，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蕴含着明显的犹太情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Religion is opium of the people.）这句话在学术界内外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国人最熟悉的经典作家的语录之一。学者们对此的理解多集中在鸦片与宗教关系的语词追溯和内含的论辩上。有许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这句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4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48页。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第140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41页。

<sup>⑤</sup> 参见摩西·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转引塔克 Tucker, 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1, p.110。

<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48页。

<sup>⑦</sup> Paul Johnso,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1987, P.352.

<sup>⑧</sup> 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sup>⑨</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451页。

<sup>⑩</sup> 参见张倩红：《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话最早来自 B·鲍威尔<sup>①</sup>，其实，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许多成员，包括鲍威尔兄弟、赫斯、费尔巴哈，甚至包括海涅等都曾指出过宗教是鸦片、酒精、麻醉剂等。青年马克思作为其中一员，受到他们思想的一些影响也是正常不过的事。这里，我们认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一“形象化的比喻”<sup>②</sup>时，可能潜在着一个特别的维度，即它含有明显的“犹太情节”，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从时间上说，这句话出自马克思在 1843 年 10 月中旬—12 月中旬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在 1843 年秋，马克思刚刚结束著名的《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关于犹太教或犹太人问题最为集中的论文。在 1844 年 8—9 月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其第 6 章大部分内容仍然是马克思关于犹太教或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前的 1842 年 8 月马克思向《莱茵报》发行人奥本海默表示，要将海尔梅斯的反犹主义“纳入另一条轨道”；1843 年 3 月，科隆犹太社团的代表找到马克思，希望他给当地的政府机构写一份请愿书，呼吁改善犹太人的处境，马克思表示了同意<sup>③</sup>。从对以上马克思几部写作时间相近的著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犹太”问题是马克思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关注热点。换句话说，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已经为我们解读“宗教是人民鸦片”所包含的犹太情怀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可能。其次，从这句话的上下文逻辑结构来看，马克思说道：“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sup>④</sup>这些话不仅是马克思对宗教的整体述评，而且也可以看做他对于犹太教的具体阐发，因此，马克思接下来说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⑤</sup>在此句话中，马克思的犹太情节更为明朗。试问，有哪一个宗教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被压迫生灵的反抗和叹息？是统治了欧洲千年的基督教吗？是荣耀的基督徒吗？如果这样，似乎不够准确，然而，假如答案换成犹太教与犹太人，则可能更少争议。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将人类解放的任务与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这其中仍然有被不公正压迫的犹太人的影子<sup>⑥</sup>。再次，马克思这句话的主题与犹太人几千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犹太宗教文化与犹太人民历史的生动写照。换言之，“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犹太人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再现，是犹太人二千年以来的受屈辱、被奴役、失去祖国而又

<sup>①</sup> 参见[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68—169 页；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81 页。关于鲍威尔的“鸦片观”来自何处的的问题，麦克莱伦认为可能是“从黑格尔对印度宗教的叙述中取来的”。

<sup>②</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701 页。

<sup>③</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1972 年，第 433 页，第 443 页。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95 年，第 1—2 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 2 页。

<sup>⑥</sup> 同上书，第 14—16 页。

坚持信仰的生动写照，也是犹太人二千年来以犹太教为纽带不断抗争、不断失败，一次又一次地满怀希望、一次又一次归于绝望的生动写照，是犹太人祖祖辈辈的希望与绝望的形象描述。它既反映了马克思对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的深刻揭示，也流露出作者对于犹太人爱与恨相交织的复杂心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句话对宗教的赞美含义大于对宗教的蔑视”<sup>①</sup>。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也时常隐含着潜在的犹太情节，决非仅此一句。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包含着的马克思犹太情节的强调，不是要否认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而只是想对之进行必要的补充，以期说明马克思思想来源与发展的多元性特征。

总之，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近现代相当多犹太裔思想家对犹太传统不同程度的远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断绝了与犹太传统的关系，比如，他们对犹太民族“求异”的思辨精神、“哲学民族”的遗传因子的继承与光大<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可以把马克思看成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sup>③</sup>，而且也不应忽视德国文化，甚至犹太宗教文化对他的影响。当代著名马克思思想研究学者麦克莱伦说道：强大的犹太“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sup>④</sup>沃尔特·拉克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无论马克思和拉萨尔这些人如何强调他们早已脱离了犹太教，并且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德国人，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但外部世界仍认为他们是犹太人。”<sup>⑤</sup>麦克莱伦、沃尔特的总体观点固然可以再探讨，但有一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即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的家庭、民族、传统的产儿，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sup>⑥</sup>犹太人的宗教、历史，以及独特的生存方式，无论对于马克思的先辈，还是对于马克思都不会不产生影响。作为一代文化巨匠的马克思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汲取和扬弃多元文化因素的产物。人们在反对无限夸大某一种因素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的结论是，无视犹太教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错误的，但是，无限度地夸大犹太传统对马克思的作用也是不明智的。（责任编辑 辛 岩）

<sup>①</sup> Owen Chadwick,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1.

<sup>②</sup> 傅有德：《犹太人：一个善于求异的民族》，《犹太研究》，2003年第2期。

<sup>③</sup> 肖宪：《马克思与犹太人》，《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sup>④</sup>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sup>⑤</sup> Laqueur, Walte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P. 23.

<sup>⑥</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585页。

#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THE MAJO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Translated by Xin Yan)

## On the Influence of Judaism upon Marx

Wang Zhi jun

In the first place, Marx was a revolutionary and critic who did not make little compromise with capitalist tradition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lso a great cultural master who drew various kinds of cultural nutrition, just because of this, the influence of Judaism upon Marx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 of Judaism upon Marx mainly as: first, the influence of Judaism as a kind of cultural spirit upon the spiritual disposition of Marx; second, there were certain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realistic and social man by Judaism and the main principle of Marx's thought; thir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 universal fraternity and the spirit of the other world, Judaism even put equality and justice and realistic life on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this had certain liaison with merciless criticism on capitalism by Marx; fourth, Marx put Judaism as a kind of life style on the corresponding place with the criticism on the money worship of capitalism; fifth, Marx's famous maxim—"religion is people's opium" contain apparent Judaic feeling.

## Gu Hongming: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in the Comparative Horiz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Han Xing

Gu Hongming was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who mastered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this standpoint, he mad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various aspects, therewith to get the unique value and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jected, and to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is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was: from the narrow sense concept of religion, Confucianism was not a religion, but from the social effect made by it, it was as same as religion, and can be regarded as broad sense religion.